

幸福,始于34年前那个绿色起点

文/《内蒙古日报》记者 施佳丽

沿着百里林带走进赤峰市敖汉旗,仿佛坠身于绿色的海洋,远山含黛,近壑拥绿,林荫夹道,荒沙织锦。很快,一个村子出现在记者眼前,林网环抱着滚滚草海,农牧民家门口堆着围墙似的树根劈柴,小院里种着几垄蔬菜……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。

这个村叫双井村。在黄羊洼镇乃至敖汉旗,双井村非常出名。“我们村种树出名气来了,还获得过‘全国绿化千佳村’呢。”村民宣长军一脸自豪地说。仔细打听,才知道眼前说话的老汉不简单。“开始建设‘三北’防护林,那个

时候他是生产队长,双井村的树就是他带头种的!”黄羊洼镇副镇长徐卫平说。

宣长军今年73岁。据他回忆,1978年,国家提出建设“三北”防护林体系工程时,正是沙害肆虐之际。“天降二指雨,沟起一丈洪,一点也不夸张。一场大风就能把沙丘往前推进10多米,早上开门发现羊都顺着沙丘上房顶了。种地别指望有多少收成,就是‘种一坡,收一车,打一簸箕,煮一锅’。”宣长军坦言,当时再不治沙,大家都不知道以后怎么生存了。

可是种树治沙是要钱

的。即使国家给补贴价,一颗杨树苗也要5分钱、榆树苗3分钱,还有开沟、雇人工的费用。村民们手头没钱,谁会愿意栽树呢?“1984年,政府出台‘谁造谁有’的造林政策,一下子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。”宣长军对此记忆犹新。

贷款、卖牛,少数人开始跟着宣长军在房前屋后栽树。“那些年雨水好,头一年种下的基本都活了,我一口气连着种了3年,种了400多亩。大家看到我们第一年种成了,也都加入进来了。三四年时间,我们村就全种上树了!”在一片榆树和杨树混合的林子

里,宣长军比划着告诉大家,“这里的树已经更新过一批了,等它们长到胳膊这么粗、一房高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给旗林业局提交申请,把树伐倒了卖钱,收益是我们自己的。”

数十年的积累,让宣长军家林木收入达到几十万元。同村村民单凤斌更是把林地当成家产,以家庭股份制形式平均分给了6个儿子。“我那会儿刚成家,家里就给分了树,也就一直管护着它们。”单凤斌的儿子单希忠还是个护林员,他越来越懂得前辈嘴边的“三分造,七分管”的分量。

1999年,一场大旱之后,杨树开始大面积枯死,这让大家急坏了。“想过给他们浇水,可是太早了,眼睁睁看着枯死好多。”宣长军心痛地告诉记者,现在的林地好几片已经退化得只剩下外面一圈树了,里面全是枯死的树。也坐在一起讨论过很多方法,最终大家认为,树种肯定要替换掉。那种什么呢?

宣长军的儿子宣晓春提议种文冠果树。“文冠果树具有抗寒、抗旱和抗盐碱的能力,比较适合退化林地。我还去看了旗里的文冠果基地,苗木和销路都打探清楚了。明年一开

春,我们就开始种!”

宣晓春11岁跟着父亲种树,后来又带着乡亲们一起参加退耕还林改造项目。种树这事儿在父子俩看来,就是一辈子要坚持做的事儿。“多亏种的这些树,固住了沙,要不然我们还过着被沙子撵着跑的日子,现在的好日子更是想也不敢想。”宣长军感慨,就是34年前的那个绿色起点,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。

如今,双井村村民40%的收入来源于林地,植被覆盖度达到了60%以上。在浓浓绿意中,他们的幸福生活正在绽放。

让老林子焕发新活力

文/《内蒙古日报》记者 施佳丽

◎微语

1978年11月,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一个彪炳史册的重大决策——在我国四大沙地、八大沙漠南缘及黄土高原建设大型防护林,这就是“三北”防护林工程。这项工程号称“世界生态工程之最”,甚至以全

球“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”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

今年是“三北”防护林工程建设40周年。回首漫长的“三北”防护林工程线,英雄与大树并肩而立。为了生存,为了子孙,许许多多像宣长军这样的造林人,在“三北”大地谱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英雄史

诗,筑就了阻隔漫漫黄沙的“绿色长城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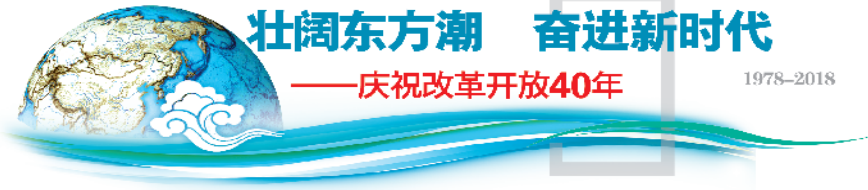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,受条件所限,在我国“三北”防护林中,种植成本低、生长速度快的杨树成为主要的种植品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像双井村这样杨树大面积老化的情况,在整个“三北”防护林地区都普遍存

在,退化林分改造势在必行。

明者因时而变,知者随事而制。从一开始“防沙

治沙”守护生存防线到“管沙用沙”绿富同兴,我们不仅需要传承荒漠植绿的艰苦奋斗精神,更需要在新

形势下走出新路子。如何让老林子焕发新活力,这是宣晓春这代造林人正在做的事儿。



四次被捕入狱的中共早期党员刘天章:火链盘腰烧,凛然贯长虹

新华社西安8月6日电(记者 李浩)“刘天章是我们高陵最早的共产党员,是我们民族的脊梁,也是我们家乡的骄傲。”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党史馆解说员陈敏暑期经常带着学生们参观,烈士刘天章的英雄事迹是她每次讲解的高潮部分。

刘天章,字云汉,1893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(现为西安市高陵区)一个农民家庭。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两年后进入化学系学习。1919年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五四运动。为此他曾遭警察逮捕,但不久即获释。

1920年1月,刘天章和杨钟健、李子洲、魏野畴等人,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,创办了《秦钟》月刊,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、新思想。

1920年春,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,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1年7月,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21年10月,刘天章和杨钟健、李子洲等人创办《共进》半月刊,并在《共进》半月刊社的基础上,创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——共进社。刘天章被选为共进社的常务主席兼编辑股主任。

1922年冬天,刘天章加入了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进步社团——少年中国学会,并当选为第四届执行部副主任兼会计。

1924年6月,刘天章从北大毕业后,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。同年秋,在李大钊支持下,刘天章弃文从戎,到当时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所在地河南开封创办学

生军,并在学兵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,任书记。1925年秋,刘天章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,与书记王若飞一起创建了开封地区的党团组织。

1927年2月,刘天章受党派遣,赴陕西任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,负责宣传工作,并兼任陕西《国民日报》社长。刘天章主办的《国民日报》,作为革命高潮时期陕西人民的喉舌,发挥了宣传革命思想、促进革命运动的作用,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,日销量达2000余份,是当时陕西地区销量最大的报纸。

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,他利用《国民日报》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的背信弃义,同年7月8日,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押。在狱中秘密组织监狱党支部,他担任支部书记。1929年夏,在

蒋、冯分裂军阀混战的形势下获释出狱。出狱不久,刘天章被派往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,任省委委员,公开身份是《天津商报》总编辑。

1930年春,刘天章在天津又不幸被捕。在狱中,他备受折磨,但坚不吐实,一直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秘密,是年9月被释放。

1930年10月,刘天章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前往山西,参与领导恢复和重建遭到破坏的山西党组织。他先后担任中共太原特委书记、山西省委书记、组织部长等职。经过他与省委其他同志的艰苦努力,山西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。同时,他还深入工农,开展工农运

动和兵运工作,组织工农武装,先后在吕梁地区建立了两支红军游击队。1931年3月,在离石县九里湾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。1931年7月4日,刘天章参与组织驻平定县的国民党高桂滋部2000余人的武装起义,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,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阜平县苏维埃政府。

1931年10月21日,刘天章等因叛徒出卖被捕。在狱中,敌人对他软硬兼施,酷刑拷打,妄图从刘天章等人身上获取我党的重要机密。但刘天章始终坚贞不屈,经受了残酷折磨和摧残,保守了党的机密,坚守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。不久,刘天章深知敌人对他们要最

后下毒手,牺牲是不可避免的,便脱下自己身上的破毛衣请狱中的党员转交给党组织,作为他最后缴纳的党费。

1931年11月13日下午,刘天章在太原英勇就义,时年38岁。他的战友赵九鹏曾赋诗撰文纪念他:“太原闹革命,潜足亦潜行。义起平定县,血染阜平城。赫光死奋勇,天章受酷刑。火链盘腰烧,凛然贯长虹。洒遍烈士血,山河焕光明。光华开昌运,是慰在天灵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山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找到了刘天章烈士的遗骸,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,并在太原双塔寺修建了烈士墓,永志纪念。

为了民族复兴·英雄烈士谱